

孙立平 郭于华 主编

制度实践 与 目标群体

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
实际运作的研究

**INSTITUTION AND
SUBJECT IN PRACTICE:**

Studies o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Laid-off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制度实践 与 目标群体

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
实际运作的研究

**INSTITUTION AND
SUBJECT IN PRACTICE:**

Studies o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Laid-off

孙立平 郭于华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实际运作的研究 / 孙立平，郭于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

ISBN 978 - 7 - 5097 - 1224 - 5

I. ①制… II. ①孙…②郭… III. ①失业 - 社会保障 - 福利制度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2695 号

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

——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实际运作的研究

主 编 / 孙立平 郭于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李 惠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7 字 数 / 276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224 - 5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论：社会转型与下岗失业工人的底层化过程	1
一 关注改革的阶段性	2
二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5
三 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7
四 资源的集中与强势精英群体的形成	10
五 资源的匮乏与底层社会的形成	15
六 社会结构显现种种断裂的迹象	22
七 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研究	27
第一章 制度的设计与制度的运作：失业人员社会保障	
问题研究	42
一 制度背景与制度实施的基本状况	42
二 制度实践与制度文本的偏离	47
三 从目标人群的角度反思制度	59
四 制度约束中的选择逻辑与参与行为	67
五 结语与政策建议	71
第二章 单位型社区的衰落与底层群体的形成	75
一 案例背景：工厂社区 20 年的转变历程	77
二 贫民区——走向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	79
三 制度制造贫困、生产底层：一种结构性解释	94
第三章 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	
社会学探索	108
一 问题与理论	108
二 常态与变态	114

三	危机与适应	125
四	体验与认知	136
五	制度与实践	141
第四章	制度与参与：下岗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行为研究	146	
一	问题提出	146
二	已有研究与本研究的立场	149
三	研究假设	151
四	资料来源	154
五	基本状况描述	155
六	模型与方法	158
七	结论及政策意涵	171
第五章	制度封闭与保障失灵：下岗失业工人获得社会	
保障的困境	180	
一	问题的产生与分析的进路	181
二	国家制度的逻辑及路径	184
三	制度封闭的过程、逻辑与机制	187
四	制度的封闭与建设开放社会	196
第六章	年轻的底层：新失业群体的出现	202
一	“新失业群体”研究：概念与意义	202
二	“新失业群体”生成的社会背景	205
三	“新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	212
四	“新失业群体”的“非工作生活”	219
五	“新失业群体”的未来：面向下一代的发展	226
附录一	访谈个案选录	231
附录二	“下岗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作”项目	
基础数据报告	296	
参考文献	326	

导论：社会转型与下岗失业工人的 底层化过程

孙立平 郭于华 秘 舒 孙湛宁

下岗失业问题是中国在世纪之交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明确这一困境发生的背景，即为其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定位，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涉及能否了解和把握失业问题的基本性质与社会后果并有效地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而且关涉到能否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进行准确的定位。无论是确定一个社会的基本政策取向，还是思想的基调，都需要以此为基础。这是我们力图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社会背景和比较深入的结构视角下关注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所在。在本书中，我们将主要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讨论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问题，这在面临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强调“90 年代中期以来”这个概念？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改革坐标”的局限性。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更多的，这种定位往往是按照“改革坐标”进行的，即“改革前”、“改革后”的论证语式。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90 年代中国社会和 80 年代中国社会的区别。实际上，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

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做 80 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某些重要的逆转。正是这些变化使得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非常不同。

第二，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缺乏敏感性。事实上，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这个逐渐在形成的社会，就已经开始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公平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如何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无论对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对思想理论界，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在支配性的“改革话语”中，在“改革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中，这些问题似乎找不到应有的和合适的位置。由于不能在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上有效地面对这类问题，不仅导致理论界许多无意义的混战，而且往往使得社会政策出现偏差。

第三，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这些新问题，有许多并不是暂时的、边缘性的。这些问题对我们构成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其中的许多因素会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长远走势产生重要的影响。正如后面的分析将要指出的，其中的一些趋势已经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因此，思想理论界及政策制定者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眼前，还有长远。

一 关注改革的阶段性

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是悄然发生的，而更多的变化则是非常明显地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只是由于我们仍然在使用一些缺乏敏感性的概念，使得我们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其实，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当中，在普通人的牢骚里，在网络上的种种意见表达中，已经频频涉及这些新的变化。但囿于旧思维的学者和思想家们，仍然固执地将这些新的变化看做过去所熟悉的那些趋势的另外一些方面。

事实上，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个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和解决这些新的问题时，需要超越过去 20 多年中一直支配着我们的那些思维。否则，一些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就有可能沦为同遗老遗少的战争。

1. 日常生活中的新社会

这种变化发生在什么地方？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任何最深刻的社会变化，往往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鲜活地表现出来。让我们从 90 年代中期流行的一句话说起，这句话就是：“微观不好，宏观好。”^① 即在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中央财政状况日益改善，货币供应不断增加，商业银行资金充裕；而在微观层面上，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市场物价持续走低，许多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劳动就业压力不断增大。概括地说，宏观的繁荣和微观的不景气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其中最令人关注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大批企业转制或倒闭而导致大量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工人下岗失业。

2.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断裂

如果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90 年代和 80 年代相比已大大不同。在 80 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改革的起点是经济生活的匮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整体经济实力上。比如，物

^① 温铁军在《“通胀”和相关政策的讨论》一文中列举了一些类似的说法：“城市好、农村不好；国有好、民营不好；股市好、企业不好；税收好、财政不好；上头好、下头不好”等等。[《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1 年 5 月 14 日。]

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住房），公共服务业的不发达（当时是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迅速改善。人们从中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图景。

但到了 90 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尽管当时中国经济是低迷的，但那是相对于我们自己而言的。所谓低迷，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在 7% 左右。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7% 仍然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了。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有经济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分。但即使我们把这个因素考虑到，按照经济学家的估计，两个百分点的水分足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 5%。即使是 5%，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了。那为什么在 5% 的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到的仍是萧条，甚至有的人感到现在的生活大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这一点，在 2000 年表现得尤为突出。2000 年，是我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经济改变了连续几年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8%。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社会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好转。具体表现在，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这当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就业状况。以历年的情况看，1997 年我国 GDP 增长

了 8.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 1.1%；1998 年 GDP 增长了 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 0.5%；1999 年 GDP 增长了 7.1%，从业人员增加了 0.89%；2000 年 GDP 增长了 8%，从业人员增加了 0.79%。

当然，这些只是在表面呈现出来的现象。在这些表象背后，需要我们分析的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演变趋势，与三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在 9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处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而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模式和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第二，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发生，导致了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的结盟和对立关系的出现。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逐步加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对中国社会力量的重组和社会生活框架的重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谈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就不能不对这三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给予高度的关注。

二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1.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开销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关于日常生活的简单判断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在 90 年代之前，

特别是在 80 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这几乎都是固定的。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当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票证供给制特征之外，还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也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直接反映这种变化的，是恩格尔系数^①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八五”末期下降到 50% 以下的，1999 年继续下降到 41.9%，2000 年下降到 40%。在 2000 年，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 50%。

2.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对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影响

应当说，这个转型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变迁有着重大的影响。但这样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几乎被我们的理论界甚至经济学界忽视了。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

① 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 以上为贫困；50%~60% 为温饱；40%~50% 为小康；40% 以下为富裕。

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名牌产品、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对于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仍旧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那次经济大萧条就是由西方世界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因此，当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这个变化或转型时，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轻视。

至于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将在下面陆续谈到。

三 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1. 80 年代的资源扩散过程及其社会效应

在 80 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提高了，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提高了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另外，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

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 80 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社会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城市中，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种现象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之后正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最后，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指令计划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2. 90 年代以来的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

在 8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官倒”现象的制度背景，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 80 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体来说，这些人数量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当时对

于一些率先致富的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其中有些人更是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的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等，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的模式是“做大蛋糕”，即在普遍改善中出现了富裕者，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到了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为数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年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

去的十几年中，他们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因企业转制或倒闭而下岗失业的工人，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都大体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特别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有学者甚至认为已经不能称其为一个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 6%~8% 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 1997 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最后，基层被掏空。由于资源配置的变化，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的数据，当时乡镇政府负债已达 2000 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的情况屡见不鲜。

四 资源的集中与强势精英群体的形成

1. 总体性资本与总体性精英

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在社会结构高度不分化的背景下，资本也高度不分化，总体性资本聚积的速度相当快。有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发展的过程，就更可以看出总体性精英扩张的迅速。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

他们大多从事较为低端的商业和服务业。但将近 20 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还有许多在市场中销声匿迹了。这可以称为一种“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事实上，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此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了。

许多人将中间阶层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20 多年来，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然而，这依然只是停留于预期的趋势。而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存在就是这种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又会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的发展。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部分城市人口也将陆续被抛进贫困人口之列。

2. 精英联盟的形成

在 80 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体制内精英曾经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是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而重要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如下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 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构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 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也不利于生产和经营。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第二，

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热潮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了这个联盟。

在上述精英的联盟中，90年代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联盟的趋势。在任何社会中，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都是社会常规运作的基本前提，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分子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1994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者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者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追逐这一流行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像旧保守主义者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当然，在此也应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进入市场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这部分人的利益是通过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的。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趋向。

3. 总体性精英对国家自主性与公共政策的影响

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国家自主性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是整个社会